

从比较角度探究刑事诉讼中 品格证据规则的运用

刘文妤 王欣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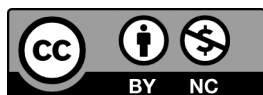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上海

摘要 | 品格证据一直是英美法证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围绕它形成的品格证据规则也成为英美法系中不可撼动却饱受争议的存在。品格证据能够作为证据出现在域外法典中，主要是因为它与案件的关联性。相对而言，品格证据的概念在我国立法中，或者说在大陆法系中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品格证据规则的精神内涵在相关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却若隐若现，在一些零星且模糊的法条中可以窥见品格证据的存在。我国是否应当对品格证据的法律文本和该规则的适用给予相应的、严格的定位。本文在分析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的发展变化，比较、借鉴国外法律优秀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品格证据适用原则和规则体系。

关键词 | 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运用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起源于英国的品格证据规则，长期以来，品格规则被认为是刑事审判中的一项基本证据规则，也是学术界最常讨论的相关问题之一，虽然品格证据规则饱受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争议，但其仍居于证据规则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具有意义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文妤，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王欣雨，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文章引用：刘文妤，王欣雨. 从比较角度探究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规则的运用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3, 5 (3): 135-144.

<https://doi.org/10.35534/pss.0503014>

另外,品格证据规则运用十分复杂,在英美法系中是最为复杂的证据规则之一,证据法对品格证据时时保持警惕,但在特别情况下排除该规则,这也是英美证据法的特色之一。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不一样,没有在其法规中构建完整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系制度,但它们也形成了相对统一、固定的操作模式,并建立了全面的品格调查体系。反观我国关于品格证据的运用与立法,没有独立的体系也没有以成文的方式界定品格证据,是否就意味着该规则在我国司法中是“行不通”的?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和运用还处于萌芽期,目前只能在一些特别的刑事案件中、零碎的法条规定中看到品格证据规则的身影。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英美证据法的一项基本规则,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考验与验证,虽然品格证据规则有些时候与其他规则相比,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且运用复杂深奥,不能死板地按照该规则一一适用,但是该规则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实用性,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应该仔细研究品格证据规则,从它的发展和演变中寻求符合我国司法的最佳解,推动我国证据法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

1 品格证据规则概述

1.1 品格证据的含义

在英美法中,简单来解释,品格证据规则就是指在一般情况下,要求禁止使用被告品行不良的证据来证明被告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诉讼一方不得将对方的不良行为作为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这是一个古老的普通法原则^[1]。

要进一步理解这个复杂的规则,首先要厘清什么是“品格”。在《墨菲证据论》中,“品格”具有三种含义,第一,“品格”可以指一个人在其生活的社区范围中的名声;第二,“品格”可以指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行事倾向性,或者说行为习惯;第三,“品格”还可以是指在过去履历,也就是先前行为中的特定情事^[2],比如一个人的前科(先前的犯罪记录)。在大陆法国家,“品格”与“人格”的概念常常被混乱使用,若是非要具体描述品格证据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身上都会拥有各自独特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稳定地跟随着个人,而品格就是这些心理品质汇聚在一起的总和^[3]。可以看出“品格”具有多重含义,对哪些应当纳入品格证据范围内还要另行斟酌和辨别。

按照汉语通俗地来解释,“品格”就是对一个人外在的道德素质等各种素质的总体概括。“品格”主要来自他人和外界在道德层面对一个人进行主观性的综合评价,可以得知,品格证据的特征就是主观性,如果允许品格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并将其作为证据使用,必然会与证据的客观性这一基本属性相矛盾。证据的客观性将被抵触,从而影响审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这也是品格证据运用复杂的且需要谨慎对待的主要原因。

1.2 品格证据的分类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依据品格证据适用的主体对象不同而细化分类以酌情适用。根据不同的标准,在国际上,品格证据的分类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 良好品格证据与不良品格证据

这种分类的标准以品格的好与坏来进行区分,同时,这也是在美国审判中对控辩双方进行品格证据交叉询问的主要类别。品行良好的证据是证明被起诉者是善良的、值得信赖的、没有犯罪的证据。品行良好的证据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被采纳,被起诉人的形象可以得到“正视”和“美化”。与良好品格证据不同的是,在普通法体系中,不良品格证据也是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通常由控方基于“开门原则”(是指普通法中品格证据排除的例外之一:如果在诉讼中,被告人首先提出有关自己良好品格的证据,或在诉讼过程中攻击另一个人的品格,就会使品格成为诉讼中的问题。当被告将自己的品格置于问题争议之中时,这种情形会引起法院对被告的品格进行盘问,即为控方提出适当的品格证据进行反驳打开了大门)被动提交对方的不良品格证据来降低相关证言的可信度,因此,对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 品德声誉证据、行为倾向性证据和先前行为证据(历史证据)

这是根据墨菲(Murphy)关于对“品格”内容的解读为标准来分类的,以证明内容为标准。作用是证明某人在所在的社区具有某种声誉的证据,这种证据就是品德声誉证据。证明一个人具有某些特定倾向性行为的证据,被称为行为倾向证据;最后一种,证明一个人过去的事件的证据是先前行为证据,先前历史行为包括一个人良好的、不良的、犯罪行为等。

(3) 被告人品格证据、被害人品格证据与证人品格证据

此类是根据证据的证明对象为标准来辨别的。被告人品格证据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被告本人为了证明自身的品格,或者为了反驳控方所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所提交的品格证据,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证据;另一方面,控方为证明被告的品格情况给审判机关提交的被告品格证据。

1.3 品格证据的功能

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硬性条件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品格证据也不例外。英美证据法上要求证据的相关性是至少应当具有形式上的相关性,而并没有对相关性的最低限度提出要求,因此品格证据在证明特定行为方面的相关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4]。品格证据虽然饱受争议,经常被排除,但其存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独特的法律功能,其功能价值是基于一个人的品格与其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一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品格,对于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品格可能带来的行为来说是不够有说服力的。这意味着,在环境、情势等许多非人控制的因素的影响下,品格不一定对行为产生必然的影响和预期效果,这也是品格证据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特性原因,但品格证据与行为之间所具有的逻辑关联性,在特定条件下也存在法律关联性,使得品格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据功能价值^[5]。

品格证据对于还原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品格证据可以帮助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人进行一定的了解,另外,对证明被告人的犯罪目的、犯罪意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可以形成相应的逻辑联系。通过对品格证据可以了解被告的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案件事实。但笔者认为需要谨慎通过品格证据了解以上所举,以免给被告产生先入为主的、狭义的标签定义。

2 关于品格证据规则的运用

起源于英国的品格证据规则,具有 200 多年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刑事案件中的基本证据规则,同时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最经常讨论的相关问题之一。根据品格证据规则的一般要求,禁止将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证据用以证明其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10, 1]。从表面来看,品格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上是被排除的,不被允许对案件事实发挥证明力。但是,品格证据规则充斥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些例外在审判中还在不断地扩大。

另外,品格证规则在不同的国家和法系中有不一样的适用情形,笔者将通过比较的方式,从发展脉络和案例出发,笔者以浅薄的知识浅层面研究国外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和立法现状,进一步讨论品格证据规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1 英美法系品格证据规则——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

英美体系的刑事诉讼模式更具对抗性,是以当事人为主体的诉讼结构,控辩双方都掌握着诉讼的主动权,所以在普通法体系中,品格证据的适用空间更大,也是讨论最多的证据概念。关于其适用规则,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按照一般要求,原则上遵循被告人品格的禁止规则,控方不得以被告人具有不良的品格等这类证据来证明控方指控的犯罪行为是被告所为。在英美法系中,被告人品格的禁止规则为主流,主要原因是:品格证据通常由人格证人以证词的形式提出,并作为对社会道德的总体评价,但由于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相关的道德判断标准也不同,因此,证人对品格证据的主观评价往往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他们容易遭受不公正的偏见的直接后果。另外,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过程中存在陪审团,陪审团往往由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并且通常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陪审团在先,法官在后,加上法官作出裁决也不会向被告以外的人解释其理由,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总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偏见主义,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了解观念与被告的不良的品格证据信息,包括前科犯罪记录等,陪审团是否会产生对被告的主观偏见,结论我们不得而知。这也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消极作用,会将案件的关注点转移到被告的社会评价上,甚至带来不公正的审判。鉴于主观偏见容易影响审判,阻碍法律的正常运行,因此在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中不会轻易适用品格证据规则,品格证据通常被排除。

美国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的一般原则是禁止使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1)项规定,作为一项基本的证据原则,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某一特定场合的行为与该品格相符,关于被告人品格或该品格特征的证据是不可接受的,但关于被告人品格的证据可以被接受,第一,如果被告人自己提交了相关品格特征的真实证据用以证明。第二,可由检察官用来反驳被告人提出的品格证据;第三,当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品格的证据时,可由检察官用来提出被告人

同一品格的证据。（公诉人提出的反驳被告人提出的品行证据；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品行证据时，公诉人提出的证明被告人品行一致的证据）^①。这在上文中笔者也有提到过，在美国证据法中，对品格证据排除禁止规则，法律设置了两种例外，也就是“开门原则”以及“以毒攻毒”，控方不能主动提出有关被告的品格证据，与此同时，这两种法律例外也受到一些限制：只有在被告人试图证明的品格与被指控的犯罪有关时，该品格证据才是可采的^②；品格证明的方式会遭到《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5条的制约。最后，在强奸案中，《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至415条的适用优于第404条。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第4款规定，其他犯罪、不法行为等的证据不能导致一个人具有某种品格特征的结论，以及证明他或她根据该性格特征从事某种行为的证据。但是，如果这种证据是用于证明目的的证据，如动机或计划的证明，那么品格证据被认为是重要的，被认为是具有参考性的。与美国不同，在英国的实践中，根据案件本身的性质，可以确定如果过去存在类似的事实，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眼前的事实是否会合理存在。如果过去存在类似的事实，本案可被认为与以前的类似案件高度相关，以前类似案件中反映的品格特征的证据可用于本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品格特征的证据。

在美国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系中，有关被害人品格证据在性犯罪案件中最为常见。在12世纪，普通法中发展出被害人的关于其性品格的证据规则，在处理案件时，法庭或者说法官极其关注被害人的贞操和平时性行为的评价，受到英国的影响，在早期美国诉讼中的强奸案审判中，被害人的性生活和性经验具有相关性且是可以采取的证据。后来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性侵案件中适用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规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强奸盾牌条款”产生，美国被害人的性品格证据规则变成：以排除被害人的性品格证据为主导，特殊情况下例外规则为补充的规则体系，这大大降低了在庭审中产生不公正偏见的风险度。

另外，美国在1994年通过了三条新的证据规则：第413条、第414条和第415

① 参见F. R. Evid. , Rule 404.

② 参见United States v. Han, 230 F. 3d 560. 该案判定，对被告人一方剔除户的品格证据，其可采性的唯一要求就是该证据与本案中的争议事实以某种形式有关。

条。这三条是第 404 条的补充。主要是在性骚扰、性侵犯案件、猥亵儿童案件中，证明被告曾经实施性侵犯犯罪、猥亵儿童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证据具有可采性。这些法条规定是否颠覆了以往的证据规则？有学者认为，该规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因为在其他案件中并不允许品格证据^[6]。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提高性侵犯案件中指控的效率是一个具有正当性的目标；第 413 条的立法历史揭示了立法机关合理地相信该规则建立在强奸案件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的基础上；在这些案件中，由于其特殊性，如果不允许这些证据具有可采性，将使很多案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7]。

从美国证据规则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品格证据一直是英美证据法中最具争议性、挑战性和创新性的证据之一，品格证据规则出现至今已有非常久的历史，规则内容在不断地更新、扩充，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况，现代的理论趋势正在影响目前的证据规则，使得证据规则的逐步创新发展。但总体来说，英美法系对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依然秉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2.2 大陆法系的品格证据规则

在大陆法系中，关于品格证据规则的成文法条比较少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243 条“法庭审理程序”中规定：只有在对与裁决具有意义的范围内，才应当确定被告人前科。对前科何时确定，由审判长确定^[8]。意思就是，在通常情况下，被告的前科（犯罪记录）原则上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只有在与判刑有关的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被告的品行证据必须只在与量刑有关的特殊情况下使用。至于“重要性”的确定，则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来决定。

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很少出现针对被告人的品格证据的应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刑事司法中没有涉及这一领域。大陆法系国家很少刻意回避有关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品格可以用来证明犯罪，也不意味着他们有意识地忽视了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不公平偏见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两个法律体系对品格证据的态度差异不仅源于诉讼理念和制度的不同，也源于其社会背景和传统。例如，在大陆法系的发源地法国，由于刑事诉讼与被告人的性质相似，所以有“品格调查”的规定。

从上述法律可以看出，大陆没有明确提到“品格证据”的概念。成文法中没

有明确提到“品格证据”的概念，只是在品格证据的相关条款中对其内容进行了规定。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对品格证据的使用比较谨慎，排除是原则，适用是例外。

3 我国关于品格证据的适用现状

在我国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品格证据”做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在表面看来我国并不存在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痕迹，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国法律中关于特殊主体、特殊案件、特殊措施、特殊证据和特殊措施的规定多多少少反映出了品格证据的精神内涵。比如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一条中对关于一般累犯和特比累犯的缓刑、假释问题的规定，也应用了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作为依据，法条中特别提出了记录被起诉人过去不良行为的文件材料，这些材料可能会影响主审法官对被起诉人的量刑，这些都体现了品格证据在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4 思考：我国是否需要建立完整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系

就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而言，我国没有统一的品格证据规范解释，相关成文立法中对品格证据的概念、分类等也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系统地解释如何适用品格证据以及如何在何种程度上适用。研究的数量和规模与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品格证据规则体系，尤其是建立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证据规则。达马斯卡认为，大陆法系的证据原则只关注一个人的品格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如果具有证明力，就应该被采纳，而很少考虑即使具有证明力，也会被赋予更大的证明力或对诉讼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的损害，大陆法系国家对品格证据的排除主要是出于政策的考虑。^[9]在我国，品格主要是刑事被告人的品格，在我国它更多被用作执行某些刑事政策的，而不是为了提高案件事实的准确性或刑事诉讼的适当性。笔者认为，我国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很多人情传统的社会，在人与人之间交际中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要把一个人的品格证据纳入正当程序，给予认定案件事实的功能，可能效果远不如英美法中品格证据规则，甚至出现反噬，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我国刑事诉

讼中,不能轻易地将被告人、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带入,尤其是在审判阶段。

品格证据在我国并非行不通,只是不具备条件适用于审判阶段——“法官自由心证期”。需要找到平衡的方式合理运用品格证据,而非一味地照搬借鉴于本土。在中国,我认为法官之间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品格证据,很容易影响法官对当事人的印象;另外,我国刑事诉讼审判中,被告一直居于弱势地位,如果被告不当地、大胆地提出关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很容易被反驳颠覆,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将被告置于不利局面。关于品格证据在我国如何应用,笔者暂时还没思考清楚,我认为按照现状,在法条中或多或少看到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则,但需要慎重地对待品格证据的用途——可不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

参考文献

- [1] 宋浣沙. 迈克逊诉合众国案视角下的品格证据规则之例外[J]. 中国检察官, 2018(1).
- [2] Peter Murphy. Murphy on Evidenc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刘立霞, 路海霞, 尹璐. 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J].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9).
- [4] 俞亮. 证据相关性研究[J].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11).
- [5] 杨帆. 论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D]. 北京: 中国公安大学, 2021.
- [6] Report of the Judicial Conference on the Admission of Character Evidence in Certain Sexual Misconduct Case [R]. 1994: 159.
- [7] 易延友. 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J]. 清华法学, 2007(2).
-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Z]. 岳礼玲, 林静, 译.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6: 105.
- [9] [美] 米尔建·R·达马斯卡. 漂移的证据法[M]. 李学军, 刘晓丹, 姚永吉, 等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王兰静. 我国性犯罪案件中的品格证据规则研究[D].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 2021.

Exploring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 Evidence Rul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u Wenyu Wang Xinyu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Character evidenc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ommon law evidence, and the rules of character evidence that have developed around it have become an unassailable, yet controversial, presence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circles. Character evidence can appear as evidence in extraterritorial codes mainly because of its relevance to the case. In contrast, the concept of character evidence i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China's legislation, or in civil law systems, but the spirit of the character evidence rule is either explicit or implicit in the relevant legal norms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existence of character evidence can be glimpsed in some scattered and vague legal provisions. Should China give a corresponding and strict orientation to the legal text of character evid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ule. While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s of character evidence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compar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laws, we explore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system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aracter evidence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situation.

Key words: Rules of evidence; Character evidence; Application of rules